

杨 述 诗 选

沧 桑 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历尽沧桑志未寒

——悼念杨述同志 〔代序〕

蒋南翔

去年九月，得悉杨述同志病危，我曾到医院探望，但当我第二次再赶去医院时，他已经停止了呼吸。我凝视着他的遗容，脑海里闪现他青年时代的面影，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他艰辛备尝、忘我奋斗的一生。我要记下一些回忆，为了纪念这位曾在艰苦岁月里共患难的战友，也为了让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青年，多少可以从杨述同志平凡的事迹中得到一点教益。

杨述同志的一生，同我国一二·九运动以来的革命青年运动有着密切联系。他毕生从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埋头苦干，孜孜不倦。在我们这批大学时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中，杨述同志是受磨难较多的一个。民主革命时期，他曾两次遭国民党逮捕入狱；入党以

后，在党内斗争中又两次受到严厉审查，特别是十年浩劫中，这种“审查”差不多是用了他的整个生命为代价的。但他无怨无悔，不屈不挠，始终保持着革命的锐气。杨述同志这种一心向党、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，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纯诚的党性。

我认识杨述同志是在清华上学时代。他于一九三四年考进清华，比我晚二年，虽然不同班级，但彼此很快就熟悉了。他身穿旧长衫，足登土布鞋，不修边幅，不拘礼仪，这在当时衣冠楚楚、崇洋空气浓厚的清华园内，相当惹人注目。有些爱恶作剧的高年级同学，在夜里结伙对他突然袭击，实行“拖尸”（TOSS）。这是清华从美国大学搬来的洋习惯，每年新生入学，高年级学生可以对他们看不顺眼的新生，进行惩戒性的“拖尸”。杨述同志坚决反抗这种侮辱，愤怒地起来搏斗。为此，当时曾在校内引起了一场要不要“拖尸”的辩论，一些进步同学，都反对这种任意欺侮新同学的行为。在次年（一九三五年）暑期学生会负责主持欢迎新同学的工作时，就正式宣告废除这个恶习。

一九三四年，清华有一个读书会性质的进步团体——“现代座谈会”，杨述同志是新同学中的第一批参

加者。他和我同在其中的哲学小组，一起学过恩格斯的《反杜林论》。他侃侃而谈，从不隐讳自己的政治见解，甚至不分场合、不问对象，公然斥责国民党的“不抵抗主义”，热情宣传抗日救国主张。同学们见他慷慨陈词，旁若无人，认定他是个左倾分子；以至有的同学想给共产党写信，不知谁是党员，便要托他代转。大家开他的玩笑，将他当时的名字杨德基戏称“杨德斯基”，笑他言必称苏联，他却毫不在乎，索性用“斯基”的笔名发表文章。

杨述同志喜欢办刊物。他进校不久，就和新入学的几个进步同学创办了《东方既白》杂志，宣传进步思想，向旧中国、旧世界宣战。一二·九运动前后，党领导下办的《觉报》、《学联会报》、《北平学生》等进步报刊，他都是主要编辑者。他那时喜爱哲学、历史，文笔也来得快，曾写过洋洋洒洒的《二千年来哲学的总清算》，这样的题目，自然不是他当时的学力所能胜任的，但也可见他青年时代的豪情壮志和思想解放。

一九三五年初，国民党大肆镇压进步力量，接连两次在清华公开捕人，清华的地下党和党领导的“社联”等革命组织都遭到破坏，“现代座谈会”被解散。有些

人怕祸及自身，不敢继续活动；杨述同志却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日，坚决参加了党直接领导的地下革命组织“民族武装自卫会”。另外，他还积极参加当时左派学生掌握的《清华周刊》的工作，担任文哲栏编辑。在一九三五年签订《何梅协定》前后，华北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，他勇敢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。无论什么工作，只要革命需要，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，抢着去做。

一九三五年九月，杨述同志尚未入党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。出狱后，他不仅毫无消极情绪，而且对革命更坚决更热忱了。一二·九运动中，他积极参加了一二·九、一二·一六两次示威游行，积极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。编刊物、写文章、作讲演、撒传单，废寝忘食，奋不顾身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对党的无限热忱。一九三六年，杨述同志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杨述同志有点“迂夫子”的味道，不那么精明能干。其实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，他是明确坚定的。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，在全国人民也在北平学生中间引起了巨大震动。如何解决西安事

变？在当时北平学生运动内部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：一种是反对张（学良）杨（虎城）扣押蒋介石，主张讨伐张学良。由于这种意见与何应钦一鼻孔出气，所以在党内没有市场。另一种意见，主张发动新的示威游行，要求公审和枪毙蒋介石。这种意见反映了多数党员和民先队员的情绪。而一般中间群众则惶惶不安，为国家、民族的前途担忧。当时的北平学委考虑到党内多数同志和进步群众痛恨蒋介石，心情可以理解，但制定政策不能感情用事，要冷静分析阶级关系和广大中间群众的思想情绪，防止冒险主义。因此，既坚决反对“声讨张学良”，也没有发动要求“公审蒋介石”的示威游行，而是从团结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共同抗日出发，主张和平解决。但是这种意见，一时很难为义愤填膺的大多数党员和民先队员所接受。当时在北平市委和北平学委之间，对此也认识不一，并发生了争论。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，释放了蒋介石，上述学生运动指导思想上的分歧意见，才归于统一。当时，杨述同志是知道这一争论，并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的极少数同志之一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杨述同志这个入党不久的年轻党

员，居然把老母、哥嫂和弟妹全家老少十人统统从家乡动员出来，变卖家资，献身革命，全家都参加了党。他的大哥一九四三年在四川被捕，惨遭活埋，壮烈牺牲。这样的毁家纾难，在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同志中，实在少有，可见他是把自己的一切统统交给了党，真是义无反顾，毫无保留的了。

一九三九年，杨述同志在四川做地下党工作时，第二次被捕。不久由八路军办事处把他保释出来，送往延安。

在延安抢救运动中，杨述同志在绥德受到隔离审查，因为他曾两次被捕，被怀疑为特务，一时作不了结论。解除隔离以后，他跑到延安，直接上书毛主席，开门见山地写道：“毛主席：人家说我是特务，我不是特务。”他坦率的、简单明了的申诉，受到毛主席的重视，当即批交有关方面复查。以后，他找了当时的党中央组织部长彭真同志，使问题得到解决。彭真同志并对他做了耐心的解释。事情过后，他不仅不再有抱怨情绪，还现身说法做别人的工作。他说：“农民簸谷子为了清除谷壳，但往往会把几粒小米和谷壳一起簸掉，这几粒小米也就不拣了。党把我这粒小米拣了起来，我还

有什么意见呢？”就这样，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，杨述同志屡遭磨难，仍百折不挠，积极工作，毫不灰心。

全国解放后，我和杨述同志同在团中央工作。他任团中央宣传部长，领导《中国青年》杂志。他很注意继承和发扬大革命时期恽代英同志主编《中国青年》的光荣传统，配合党的中心工作，联系实际，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，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，使《中国青年》真正成为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，引导青年正确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。解放初期，知识分子热情奔放地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，积极进行思想改造，主流是好的，但也曾出现过某些急躁情绪。清华大学曾进行“思想总结”，以人人过关的方式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。思想检讨不好者，被认为“顽固堡垒”，要集中火力进行批评。杨述同志当即组织《中国青年》的编辑写了《思想改造性急不得》的评论，分析了思想改造的长期性，明确提出思想改造绝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。这篇评论很快为《人民日报》转载，对解放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起了指导作用。当时清华大学校务维持会负责人吴晗同志曾亲口对我说：

“这篇文章帮助清华及时改正了思想改造简单化的缺

点。”

一九五〇年，当解放之初为协助新区工作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过去之后，青年团的首要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引导广大青年和学生，把注意力转到学习业务和科学这个主要方面上来。对于这个历史的必然转折，有些同志认识模糊，杨述同志亲自写了题为《青年要精通业务，掌握科学技术》的社论，在建国后的第一个五四青年节发表。社论明确指出，我们用枪炮推翻了旧社会。但是建设新社会，消灭贫穷落后，就必须换一种新的武器，就是科学技术。号召青年们要学有专长，通晓本行，努力成为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各行各业的专家。社论经《人民日报》转载，向全国青年指明了学习的方向。

思想工作要防止简单粗暴；青年学生要又红又专，既不能迷失大方向，又不能搞空头政治。这是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方面，五十年代初就已明确解决了的两个根本原则问题。可惜的是，三十年后的今天，由于十年浩劫造成的恶果，却又成为我们必须重新加以解决的课题。

五十年代，杨述同志还领导创办了《中国青年报》，任第一任总编辑，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青年教育和宣

传工作，应该说是相当有成效的，曾为培养和造就一批既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工作的革命接班人，做出了贡献，很受青年们的欢迎。直到今天，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老同志，一提起当年创业的艰辛，还回忆起杨述同志身体力行，为办好刊物和报纸花费了大量心血。

杨述同志的革命精神不仅表现在脚踏实地的工作上，也表现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性和斗争性上。一九五三年，杨述同志离开团中央到北京市委担任宣传部长，兼任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二书记。我到清华工作，兼任北京市高校党委第一书记。我们继团中央之后，又在高等教育战线继续合作。在重大的教育方针问题上，我们的意见常常是一致的。一九五六年，在全国经济冒进的影响下，教育事业亦被要求加快发展速度。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直线上升，从一九五五年的九万八千一下跳到一九五六年的十八万五千。这种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学校的客观可能条件，不少学校出现了紧张被动状况。石油学院报告说，“居住生活条件，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，又没有足够的教师给学生上课”，恳请减少招生任务。我和杨述同志都认为，不顾实际可能，不把发展速

度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，必将导致高校质量下降，工作被动。于是我和杨述、宋硕同志联名写了《关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》一文，发表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的《北京日报》上，明确提出招生任务已超过高校实际可能。要求“中央能够重视这个问题，并责成有关部门核实需要，考虑可能，加以解决”。可惜当时无法改变既成事实。结果，直线上升的招生人数在第二年就不得不猛跌下来，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三起三落中的第一次大起大落。现在已看得很清楚，一九五六年高校招生中的冒进，就是经济上冒进在教育领域的反映。实践证明，需要和可能必须统一。经济发展要量力而行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要量力而行。不承认这一条，就不能不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。

当时高等教育战线还争论过大学可否表扬先进集体的问题。高教部的苏联顾问认为表扬先进集体就是违反教育原理和苏联经验，必须坚决取消。当时报刊还发表了一些批评搞先进集体的文章。杨述同志当时明确表示：表扬先进集体的做法不可一概否定。有的大学搞先进集体的实际效果是好的，要尊重实践的经验。是否采取这种形式，可由各校分别情况自行决定。这个意见也

被写进《关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》一文，提出：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，凡是实际生活中证明有害的东西，它就应该被抛弃，凡是实际生活中证明有益的东西，它就有存在的权利。”二十多年的实际经验充分证明，评先进集体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集体主义精神，是加强学校班级工作和思想教育的行之有效的经验。

杨述同志献身革命几十年，一直在党的宣传教育战线工作，他的一个突出特点，就是热爱青年，热心青年工作。他本人是从参加学生运动投身革命的，能够设身处地地替青年着想，理解他们的愿望和感情，原谅他们出于幼稚的缺点和错误，满腔热忱地进行帮助。青年朋友们所熟悉的许晓轩烈士（小说《红岩》中许云峰的生活原型），就是抗战时期杨述同志担任川东特委青委书记时，亲自提许为青委宣传部长，并热情帮助他办起了《青年生活》杂志的。杨述同志一生曾亲手培养出不少青年干部，许多人成了今天各条战线的骨干。

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，我和杨述同志都是执行了反右方针的。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，国际上发生了反共逆流，爆发了“匈牙利事件”。中国也有人

希望出现“匈牙利事件”，指责共产党执政后“今不如昔”，要求各党派“轮流坐庄”，要求共产党下台“下轿”，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，要求民主党派出来收拾局面。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：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五七年这段时期，正是我国欣欣向荣，成绩最大，进步最大的时期，当时指责新中国的“今”不如旧中国的“昔”，要求摆脱共产党领导，这是颠倒黑白，根本违反人民利益的。因此，正象党中央所指出的，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，错误在于扩大化。杨述同志出于直觉，对于在青年学生中划很多右派，总感到有点惋惜。在运动开始之时，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在校内贴出了大量大字报，清华几天无动静。有人批评清华落后，“放”得不够。杨述同志却同意清华的做法，认为这样做，有利于维护教学秩序，是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。在一次党的会议上，他曾当场发言，反对把一位青年作家划为右派。反右派运动过后，他还热诚帮助过一些被划成右派的青年干部，仍然和他们往来，鼓励他们振作起来，为革命继续工作。

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杨述同志没有什么个人嗜好，他把为党工作视为最大乐趣。就是这样一个把个人

的一切都贡献给党的同志，“文革”初期就被登报点名批判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还拖了两年。最早批判，最晚解决，整整十二年，他受了无法言说的折磨虐待，肋骨被打断，患了严重的脑血管病。这种精神和身体的长期重负，可以摧毁一般人的意志，但他毫不消极，毫不颓唐。最感人的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仍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当他多次挨斗，被打得遍体鳞伤时，他还淳淳告诫自己的女儿说：“我也许会被打死，即使被打死了，你们仍要跟着党，革命到底！”杨述同志这种对党和革命的一片赤忱，对于党性未泯者不能无动于衷，看风使舵、投机革命者应该自惭形秽。

他的问题解决之后，几次拄着手杖，由韦君宜同志搀扶着来找我。由于疾病折磨，他已经讲不出多少话来，只是反复说：“我好了，我要工作。”劝他养病，他就发急，直到又一次脑血管发作，站不起来才停止。我手边还保存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他刚获“解放”寄给我的一封短信。信写在临时找来的半张纸上。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已恢复党的组织生活，组织上准备让他担任社会科学院顾问。信的最后一句是：“我现在（身体）未全恢复，下周即去广州疗养，待疗养一段时间

后，再多做工作。”这朴素无华的短信包含着一个老战士对党的赤子之心。为党工作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和全部寄托，当这个被无理剥夺了十二年之久的神圣权利又归还给他时，他就喜不自禁，一点不顾自己重病在身，只想着要赶快工作，多做工作。

杨述同志在十年浩劫中曾写下一首诗：

身经百斗丹心在，历尽沧桑志未寒，
棒喝鞭笞都不死，好留肝胆与君看。

这的确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。只有对自己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永远信心百倍的人，才能不论潮长潮落，荣辱安危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杨述同志一生虽无赫赫之功，但他埋头苦干，之死靡它的精神，是感人至深的。我们的党，正是因为有这样大批忠心耿耿、坚强不屈的骨干，砥柱中流，甘做基石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风云变幻、波涛汹涌的世界洪流中坚不可摧，破浪前进！杨述同志虽然去世了，许多赤诚革命的老同志虽然饮恨长逝了，但是他们的血没有白流。“血沃中原肥劲草，寒凝大地发春华”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浇灌了社会主义之花。他们一心向党、鞠躬尽瘁的革命精

神，对于革命人民将永远是一种激励。他们经历的种种磨难，国家和民族遭受的旷古罕匹的浩劫，促使我们清醒地总结历史经验，敢于实事求是，冲破任何个人迷信，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更坚强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。

一九八一年三月

蜡炬成灰

——痛悼杨述

韦君宜

杨述已经去世了，寂寞地死了。他想做的工作没有做成，他想写的东西也无力写出，就此结束了他难以瞑目的一生。使生者心里的缺憾永远无法填补。

三十九年天天在一起的人忽然没有了，这是很难使人接受的。我翻他的抽屉，翻出他亲手包得好好的一包一包笔记本：政治学习笔记、日记、抄古人的诗、抄天安门的和流传的反“四人帮”的诗。我想整理整理，为他写一点东西。但是千头万绪塞在我胸口，再也无法用三两千字把它说出来。

我第一句要说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。入党四十三年，以能作一个党员为生平第一要事。除了为党